

空间转向的人类学意义

齐学红, 李云竹

(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 经典人类学更多关注少数民族或部落的文化现象, 在研究内容和方法论上对于认识当代社会的借鉴意义有一定局限性, 进而在学科知识领域中往往处于边缘地位, 很难发挥其应有作用。近年来兴起的空间研究, 在拓展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同时, 也存在一些无可避免的缺陷, 不能为社会学研究反复揭示的阶级、阶层区隔, 城市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和现代城市病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可能性。顺应多种学科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 研究将从生态人类学角度对空间研究进行补充, 进而探讨其对当代教育的启示及其学科意义。

[关键词] 古典人类学; 空间研究; 生态人类学; 学科意义

[中图分类号] G40-0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779(2011)01-0018-04

作为一门学科的人类学到19世纪下半叶才逐渐系统化, 在初始阶段, 人类学和其他学科一样, 都热衷于发现或探讨人类社会各种制度的起始阶段: 人类的起源、宗教的起源、法律的起源、婚姻的起源等等。这种倾向一直继续到20世纪上半叶, 人类学者试图通过对非洲、北美、太平洋岛屿等远离欧洲和现代工业, 被当做“原始”、“野蛮”或“简单”社会文化的研究, 探讨人类社会初始阶段的各种制度, 从早期主要依赖传教士、探险旅行者、殖民官员等所写的游记、日记和见闻记录到人类学家亲身从事田野调查。二战后, 随着传统研究空间日益受到限制, 加上人类学者在与被研究对象的互动中对自身研究经验、自身社会文化的反省, 学者们逐步冲破原来传统研究的时空限制, 在关注简单社会文化的同时开始注意这些文化的历史, 尤其在曾经是半殖民地或殖民地的国家, 学者们首先将研究视野集中在对本国社会、文化和不同族群的研究上来。

一、对古典人类学的反思

古典人类学者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原始资料, 这些第一手资料对今后的人类学研究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加深了我们对世界文化、种族的了解,

有助于我们在研究中摆脱民族中心主义的狭隘观念, 以平等宽容的态度对待异族文化。

我们必须客观认识这种原始的第一手资料。人类学者的考察无疑会受到自身文化、政治、权力、权势、世风、世界观与知识结构等诸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可能会扭曲知识的生成体系, 此外, 记录者的情感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撰写成果。^[1]同时, 田野“参与观察”方法也并不是万能的, 容易出现异文化研究“进不去”和本土化研究“出不来”的尴尬境地, 视界的融合与文化的解释因为受到时间、空间、研究者的个人生活史等主观条件的限制, 必然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客观性、真实性等方法论问题也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日新月异, 科学飞速发展以及学科自身理论建设的完备, 人类文明经过原始农业时代, 进入了工业甚至后工业时代, 新的时代为学科发展注入新的内容和活力, 同时也需要新的学科知识推动时代的发展。显然, 古典人类学的资料已不再适合当今社会的发展需要, 作为一门研究人类自身及其人类文化的学科, 必须在“回顾过去”的同时关注现实, 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人类学“文化化石”的研究。

[收稿日期] 2010-12-05

[第一作者简介] 齐学红(1965-), 女,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研究

二、人类学研究的空间转向及其可能

20世纪60年代末之后,人类学者对主流文化的探索提上日程。城市因为经济较发达,人口复杂,文明程度较高,主流文化体现较明显而成为现代人类学家的重点关注对象。人类学对空间的研究转向首先从城市开始。

(一) 空间转向的新视野及其反思

在社会学的早期研究中,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经典社会学家的作品中已经存在空间与社会的内在联系。德国的滕尼斯和齐美尔对空间予以专门的研究。在空间研究方面最早形成系统理论的是人文区位学派及芝加哥学派。这一学派把社区看作是一种生态秩序,并借用生物学的生态理论来研究社区环境的空间格局及其相互依赖关系。人文区位学把城市空间结构和秩序的形成看作是“自然”结果,其决定力量是群体的经济竞争力。学派创始人伯吉斯的同心圆理论,霍伊德的扇形理论,哈里斯和厄尔曼的多核心理论都是从生态地理的角度对城市区位进行划分。“城市的组织,城市环境的特征,以及城市秩序的特性,最终都是由城市人口的规模决定的,是由这些人口在该区内集中与分布的形式决定的。”^[2]人口结构的变化和人口流动是人类生态学家展开其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但是他们对人口研究的社会学价值并不在于人口研究本身而在于人口对人类群体生活的影响。学者们注意到,在城市环境中,人口大规模的流动瓦解着邻里关系,而邻里关系的变化意味着首属团体中原有的抑制作用和道德训诫被削弱了,刺激关系取代首属关系成为趋势,基于道德的社会控制被基于成文法律的社会控制取代。^[2]他们还注意到,城市中流动着的人口最终将具有相同特质的人口聚居在一起,形成“自然区”现象,自然区的出现势必造成与外界隔离,而在其内部,由于“共同的种族意识和共同的阶级利益把邻里情感熔炼得十分紧密”。^[3]由此可见,芝加哥学派将城市视为一个相互依赖的共生社区独立加以研究,他们把城市空间看作一种纯粹的自然现象,城市空间区位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形成是竞争和选择的自然结果,人类通过群体的发展适应迅速变化的城市环境。在空间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人类生态学基本上以经济行为涵盖了社会行为,社会行为和空间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被简约为经济关系。^[4]

20世纪70年代是空间研究的关键时期。在美

国,文化区位理论把文化因素引入城市空间研究,代表人物是费雷,他认为传统人文区位理论过分强调经济因素对空间分布和变化的影响,把物质空间的性质视为自我赋予的,社会体系是物质空间的被动适应者。费雷认为应该重视文化的因素,他发现文化有其象征功能,独立于经济之外,空间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工具,在人们的聚居过程中起关键作用。^[5]同时在欧洲,新马克思主义兴起,人们在经验研究中开始关注社会性、历史性和空间维度的同质性和相互关联性,关注城市空间对人的意义以及创造容纳社会生活的场所的行为,^[6]“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主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框架下去考察城市问题,着重分析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和集体消费,以及与此相关的城市社会阶级斗争和社会运动;力图揭示城市发展如何连接、反映和调节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及如何体现出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7]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空间的研究已形成一种专门的学术取向,在后现代主义文化风潮中,空间研究呈现出多层面、多向度的不同取向,大多和现代性相联系,并以反思现代性的面目表现出来。福柯和吉登斯是突出代表,福柯认为城市设计暗含一种巧妙的统治目标,存在着一种城市的权力政治,即权力是借助城市中的空间和建筑布局来实现和发挥作用的,城市完全变成了一个统治机器。^[7]而吉登斯在其现代性研究以及结构化理论中,赋予了时间和空间同等重要的核心地位,成为其理论研究的核心概念。20世纪90年代后,“新文化地理学”以及关于“空间、认同与再现”的研究日渐凸显,并呈现出不同的研究主题,如主体认同、族群、性别、性欲特质、地方感、空间政治等,都与“文化再现”主题密切相关,与之前的经济之维、政治之维形成了鲜明对照。20世纪末,学界开展的“空间转向”的研究,依赖于侵入空间的各种模式,空间演绎为看待和理解城市的新方式。学者们开始演绎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空间性”,把以前给予时间和历史,给予社会关系和社会的知识反应,转移到空间上来,关注城市空间是如何隔绝人们的自由实践,又是如何促使人们找到自我空间的分布,关注在空间中的定位、移动和渠道化以及符号化他们的共生关系。

城市空间研究是对关注社会阶层、阶级区隔的社会研究和城市发展的历史研究的一种补充,更好的解释了城市的阶层差异、结构分布、运作机制等方面问题。这种研究更多的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关注

社会结构，却没有注意人在城市中的价值，并没有为缩小阶层差异、消除城乡距离提供很好的解决方案。这就需要人类学进行补充，生态学对此是一种很好的解决方法。生态学强调整体观念和生物多样性，关注弱势群体，注重公平平等，强调和谐共存和和平相处。其实，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类学者普遍开始对生态学的研究角度发生兴趣。这种研究趋势的增强，一方面与人类学中文化价值与模式以及结构主义解释缺陷的普遍反思和质疑有关，另一方面与环境污染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人类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现实密切相关。有人认为，20世纪以来，人类学有三个主要的研究角度：观念的人类学、社会结构的人类学、生态的人类学。^[8]可见生态学已经引起人类学的关注。

（二）生态人类学理论及对空间研究的启示

生态人类学是指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人类、生态环境及文化之间关系的学科。“生态人类学”一词，据知是由美国的维达和拉伯波特（Andrew P. Vayda & Roy A. Rappaport）于1968年最早使用。^[1]至今仍有一些学者在研究中习惯用文化生态学来指代生态人类学，其实两者概念是不同的。从范畴上来说，文化生态学是生态人类学研究的一部分，它侧重研究人类的社会文化特质与环境间的关系，而生态人类学除关注这些外，还关注人类的生物特质与环境的关系。^[1]

1. 文化生态理论。文化是沟通人与能源、资源等的一个桥梁。人类通过文化认识到能源或资源，同时又通过文化获取、利用能源或资源。斯图尔德在其《文化变迁的理论》中指出在一个文化系统的诸多文化特征中，有一组较其他文化特征有更大功能的文化特征是文化系统的决定因素。为此他用“文化核心”和“次级特质”两个概念进行区分。文化核心是指那些和生计活动与经济安排有密切关联的特质的集合，包括那些与经济安排有决定性关系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等文化模式。而其他则属于次级特质，源于纯粹的历史文化因素——源于随机的创新或者传播。文化形成和进化的决定因素是文化核心，次级特质使具有类似文化核心的各种文化体现在文化上各有其独特性。文化核心决定文化类型，核心特征相同的文化可划归同一类型。

2. 文化唯物主义认识论。哈里斯认为所有的文化特征（包括技术、居住模式、宗教信仰与仪式）都是人类对自然环境适应的结果。主客位观点被哈里斯认为是文化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核心。

主位文化的观点即以参与者或文化负荷者的观念和范畴为准，也就是以本地提供消息的人的描述和分析的恰当性为最终判断。客位文化表示科学的判断，可经由任何受过训练的观察者来加以证实，或者说把旁观者在描述和分析中使用的范畴和概念作为最终的判断。

3. 系统生态理论。拉伯波特认为，人和其他生物非生物之间是在一个物质交换系统中互为环境、互有影响即人对环境有影响，同时也受到环境的影响。^[9]生态人类学对我们有以下启示：

第一，以更为辩证和互动的方式看待自然与文化的关系。^[10]不同的民族和地区会形成不同的文化类型，同一地区也会有不同的文化特色。一方面应允许不同文化的存在，对文化差异持一种宽容的态度，而不是试图以主流文化同化边缘文化；另一方面，应该借鉴彼此之间的文化成果和科技成就，来改造自身文化的地区缺陷，充分利用当地优势资源，与环境和谐相处。

第二，人类学应将分析单位从原来的“地方”和“区域”进一步扩展到“国家”和“世界”，关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作用。^[10]城市空间研究只是针对城市这一生态系统研究，具有孤立封闭的缺陷。由于全球化和世界体系的影响，今天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必须关注地方、区域、国家和世界之间的联系，关系全球人口、技术、资本、影像、信息和观念的流动对地方社区生态和文化的影响。

第三，应注意保存乡村和少数民族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风俗、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使其与城市主流文化共同发展。全球化进程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城市的特征在全球各地越来越明显，世界正朝着同质结构的方向发展，这与生态学强调的多样性是相违背的。生态人类学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理解可以开拓人们的视野，丰富人们的生活，维持人类生态系统的和谐与稳定。

三、教育人类学的新进展

城市空间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市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衡，受教育机会的不公平，教育的成效参差不齐等。所以我们应该积极向生态学寻求新的教育思路，以期解决教育中长期存在的顽疾。

第一，教育要服从“人一自然”系统的整体利益，以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协调发展，这就需要我们树立经济价值、精神价值和生态价值相统一的价值观，使教育在赋予人类开发自然的意识

和能力的同时,赋予人类保护自然的意识与能力,注重精神陶冶和享受生活。并且促成三者有机结合。这是对社会中突出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问题的回应,也是我国强调素质教育的重要方面。

第二,我们需要从生态角度对教育传统功能进行新的审视与思考。经济功能不仅是物质生产与再生产,同时也包含着对生产的合理节制,包含着对自然资源的珍视与保护;全球性的生态问题也成为政治教育的关注热点;文化将朝着“人一自然”关系的人道化方向延伸。

第三,生态观以其整体论思维和广泛的关怀伦理,关注弱势群体的情怀和博大宽厚的建设性生态向度,启发人们在教育公平问题上要关注弱势群体,在制度设计安排上要考虑科学公正性、体现法治精神,要有广泛意义上的生态关怀。^[11]

第四,生态环境强调差异性,不同的民族和地区有不同的文化类型,不同的文化类型会影响教育的需求、内容、方式和组织形式,针对不同区域、不同民族进行的教育必须立足于本地、本民族的文化类型,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制定切实可行的教育方案,以实现保护人类多样性的目的。

第五,借鉴系统生态学视角,教育不仅自身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而且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作为一个独立系统,教育生态系统包括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以及教育物资等既相互影响又相互交叉的基本要素,要处理好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协调配合发挥教育系统最大的功能。作为社会的子系统,教育要与经济系统、政治系统、文化系统沟通合作,保证社会顺利发展。

【参考文献】

- [1] 庄孔韶. 人类学通论 [M].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3.
- [2] 帕克, 等. 城市社会学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7.
- [3] 康少邦, 张宁. 城市社会学 [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 [4] 高峰. 空间的社会意义: 一种社会学的理论探索 [J]. 江海学刊, 2007, (2).
- [5] 叶涯剑. 空间社会学的缘起及发展—社会研究的一种新视角 [J]. 河南社会科学, 2005, (5).
- [6] 潘泽泉. 当代社会学理论的社会空间转向 [J]. 江苏社会科学, 2009, (1).
- [7] 张应祥, 蔡禾.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述评 [J]. 学术研究, 2006, (3).
- [8] 内亭. 文化生态学与生态人类学 [J]. 张雪慧, 译. 民族译丛, 1985, (3).
- [9] 曹燕. 生态人类学及其对教育的启示 [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1).
- [10] 张雯. 试论当代生态人类学理论的转向 [J]. 广西民族研究, 2007, (4).
- [11] 李业才. 后现代生态观及其对教育现代化的启示 [J]. 职业技术教育, 2009, (10).

Anthrop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Spatial Turn

QI Xue - hong, LI Yun - zhu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4, PRC)

[Abstract] Classical anthropology took more attention on cultural phenomenon of minorities or tribal. Its research contents and methodology has certain limited reference for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then was often marginalized in the field of academic knowledge. It is difficult to play its due role. The space research rising in recent years are existed some inevitable defects while expanded the research field. It can not provide 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possibility for problems which the sociology study has revealed repeatedl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lass and Stratum, the growing polarization of the city and modern urban disease, etc. To meet the developmental trend of multi - discipline inter infiltration, the paper give a supplementary study on space study from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and then discuss its meaning for contemporary education.

[Key words] classical anthropology; space study;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discipline meaning

(责任编辑 苏二利/校对 舒澍)